

福建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研究

姓名：张涛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应用语言学

指导教师：谭学纯

20070401

福建师范大学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姓名）张涛 学号 2004202 专业 应用语言学 所呈交的论文（论文题目：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研究）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本人了解福建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的学位论文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学校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保密的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张涛 指导教师签名 谭学纯
签名日期 2007年6月7日

摘要

长期以来,国内语言学界对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研究多为一般介绍和评论,对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影响较少系统的认识。本文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围绕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为什么”和“是什么”两个问题,阐述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学术传统和学科传统,回顾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发展历程,比较分析其三个阶段的成果,客观分析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贡献和局限性,力求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伦敦学派语境理论在语言学发展史上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伦敦学派; 传统; 发展历程; 贡献; 局限性

Abstract

Since a long time ago, the research on the Context Theory of the London School by the domestic linguistic world is mostly general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They seldom have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of the Context Theory of the London School. Revolving “Why” and “What”, by using the method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the academic tradition and discipline tradition of the Context Theory of the London School, and reviews the developing course of the Context Theory of the London School. By comparatively studying the achievements in three stages, this article objectively analyzes the contribution and limitation of the Context Theory of the London School. This article tries to give prominence to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ontext Theory of the London School in the developing history of linguistics in a certain degree.

Key Words London School; Tradition; Developing course; Contribution; limitation

中文文摘

本文主要探讨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四个问题。一是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研究的意义；二是伦敦学派语境理论产生的背景；三是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发展历程；四是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贡献与局限性。全文共由五章组成。

第一章绪论主要说明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研究的意义。文章从伦敦学派对语境研究的贡献写起，介绍了伦敦学派既善于继承又敢于创新的特点。描述了国内学界对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研究现状以及存在的理论研究薄弱环节：一是对伦敦学派提出语境理论的历史意义不够明确，即对伦敦学派在当时“为什么”能够提出语境理论以及该理论的历史地位分析得不够充分；二是就理论谈理论，对伦敦学派语境理论“是什么”这个问题缺乏更深入的探讨，对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独特性认识不足。这种研究状况不能很好地反映伦敦学派在语境理论上的开创性和深远影响。最后，围绕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研究中的“为什么”、“是什么”两个问题，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力求全面、客观地对伦敦学派语境理论进行分析与评价，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伦敦学派语境理论在语言学发展史上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二章和第三章分析伦敦学派语境理论产生的背景，即伦敦学派语境理论产生的主客观条件。第二章主要分析了伦敦学派语境理论产生的客观条件。伦敦学派的学术传统为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准备了动力，社会学学科形成之前的悠久传统则为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理论资源。第三章主要分析了伦敦学派语境理论产生的主观条件。通过语言性质、语言学家的任务、研究方法三个方面梳理伦敦学派的语言学思想，找到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理论基础，并参照和对比其他语言学派在“语境”上的观点，揭示伦敦学派语言学理论的贡献与独到之处。

第四章介绍和评论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发展历程。注重通过纵的比较，分析伦敦学派语境理论不同发展阶段的成果与不足。本章以三个不同阶段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1884—1942)、弗斯(John Rupert Firth, 1890—1960)、韩礼德(M. A. K. Halliday, 1925—)为主，对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发展进行描述和分析。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1) 酝酿阶段：广泛吸收来自语言学科内外的创新成果，借鉴国内外语言学界的优秀成果。马林诺夫斯基提出“情景语境”的概念，并把语境分成两类，即“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提醒人们在理解词义时要考虑“语境”，提出“意义是语境中的功能”的著名观点。最后分析马林诺夫斯基“语境”思想的贡献与不足。“语境”

思想为意义的研究开拓了视野,也为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理论资源;但是马林诺夫斯基只是初步提出了“语境”思想,对“语境”进行了简单的分类。而且马林诺夫斯基在意义研究中对“语境”即语言外因素重视的同时,忽视了语言内因素的作用,同时对构成语境的因素以及语境对语言使用的影响方式并未涉及。

(2) 创立阶段:在广为吸收来自各方面观点的基础上,加以提炼,构建语境理论。弗斯初步完成了语境理论的构建。一是他论证了语境理论构建的重要性,为语境理论的建立找到了现实的需要。二是在意义的研究上弥补了马林诺夫斯基的不足,在重视非语言因素的同时,也重视语言因素的作用。三是首次完成了对语境因素的概括。四是弗斯认为语言描写都是语义描写,把“语义就是情境中的语言”这个等式的应用范围扩大到语法和语音的分析上,使他在语音学上的成果——“韵律分析理论”,也成为了语境理论的一部分,进一步扩展了语境理论的应用范围。但语境究竟如何影响语言使用,弗斯并未解决这个问题。

(3) 发展阶段:针对理论以及实际应用中的不足,提出新的观点和解决策略,完善理论的建构。韩礼德在弗斯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语境理论。一是将“系统功能”思想融入了语境理论,韩礼德采用间接的方式,通过分析语言和语义的性质引出“语境”。二是从理论实际应用的角度对语境重新定义,对语境的组成因素进一步划分,并从系统与结构的关系、意义的确定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修正弗斯的一些观点,推动语境理论的发展。三是针对弗斯未完成任务——语境因素如何支配语言系统的选择,进行了解释。

第五章分析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贡献与局限性。本章采用罗宾斯(R. H. Robins)和刘润清的观点,力图还原历史原貌,对语言理论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首先从两个方面分析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贡献:一是语境的自觉应用;二是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对语言学科内外的贡献和影响,提供了一条语义研究的新途径,推动了语用学的发展,并在语言学习、翻译、“人工对话”等方面得到运用。其次分析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局限性,一方面从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研究的角度,指出了其存在的缺陷:(1)忽视了内部世界,未从说话者个体的内心世界出发去探索语境与语篇之间的相互关系。(2)忽视了语言使用的独特性或个性。(3)以静态研究为主,忽视了动态研究。另一方面从主客观条件出发,分析了伦敦学派语境理论存在局限性的原因。最后针对伦敦学派语境理论存在的局限,对今后的语境研究趋势作出了展望。

第1章 绪论

1.1 伦敦学派简介

“伦敦学派是当今语言学界的一个重要学派，与美国的结构主义派和转换语法派、捷克的布拉格学派、丹麦的哥本哈根学派同样为人所注目。”^[1] 伦敦学派(The London School) 又称弗斯语言学(Firthian Linguistics)。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弗斯是英国语言学界的中心人物。1944年弗斯任伦敦大学普通语言学教授，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任语言学教授，是英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英国第一代语言学家大都受过他的教育，第二代语言学家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他的熏陶，继承和发展了他的语言理论。弗斯从1938年就开始在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研究院教授语音学和语言学，在伦敦大学长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弗斯的语言学理论逐渐成熟，同时伦敦大学也成为传播其语言学理论的最好平台。因此，以他为首的英国语言学派被称为“伦敦学派”。

伦敦学派从形成到活跃于语言学界，其发展的过程并不是很长，但是该学派的理论对语言学科以及其他学科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为了更好地认识伦敦学派，首先需要对伦敦学派的发展阶段进行大致的划分。这需要一个划分的标准。划分标准可有以下两种：一是以学派的代表人物为依据，则伦敦学派可分为“弗斯学派”和“新弗斯学派”两个阶段。二是以学派的某种主要理论的发展为观察点。本文参照第二条标准，阐明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学术传统和学科传统、伦敦学派的语言学思想、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发展历程、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历史贡献与局限性，力图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以伦敦学派的语境理论为观察点，伦敦学派可分为三个阶段：(1) 酝酿阶段：广泛吸收来自语言学科内外的创新成果，借鉴国内外语言学界的优秀成果。(2) 创立阶段：在广为吸收来自各方面观点的基础上，加以提炼，构建语境理论。(3) 发展阶段：针对理论以及实际应用中的不足，提出新的观点和解决策略，完善理论的建构。

在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创立与发展中，马林诺夫斯基、弗斯、韩礼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马林诺夫斯基是著名的人类学家，他出生于波兰一个贵族家庭，但一生大

^[1]王宗炎：《语言问题探索》，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第94页。

部分时间却生活在英国。在人类学研究中,大量的实地考察让他发现了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开始对语言的功能和意义发生了兴趣。他先后提出了“情景语境”和“意义是语境中的功能”^[1]的观点,为语言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为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理论资源。弗斯作为伦敦学派的创始人,延续了英国语言研究“实用性”的传统,继承了亨利·斯威特(Henry Sweet)、丹尼尔·琼斯(Daniel Jones)在语音研究上的成果,开创性地提出了“韵律分析法”。还接受了马林诺夫斯基“情景语境”和“意义是语境中的功能”的观点,在此基础上,以语言因素为标准,将“语境”分成由语言内因素构成的语境和由语言外因素构成的语境,并首次对语境的因素进行了概括,完成了构建语境理论的任务。罗宾斯因此说“语言学在两个方面的发展是与弗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他的情景语境理论,或更概括地说,是他在语义方面的语境理论和音位学中的韵律分析。”^[2] 韩礼德继承了弗斯的两个基本观念:一是“情景语境”,二是系统和结构的区分。但韩礼德不同意弗斯对系统和结构的排序,提出系统是第一性,结构是第二性的观点,推翻了弗斯所认为的结构先于系统而存在的观点。韩礼德把系统思想融入语境理论。指出语言形式在语言系统中进行选择,同时它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伦敦学派与二十世纪其他学派相比,它的特点是既善于继承又敢于创新。它延续了英国语言学“实用性”和“开放性”的传统,以使用中的语言为研究对象;注重语言意义和语言使用情境的研究;把语言看作一种社会现象,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将非语言因素引入语义研究,为语义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1.2 国内的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研究综述

弗斯创立的伦敦学派在英国备受推崇,在英国国外很长一段时间内却毁誉参半。这源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弗斯与当时欧美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观点不同,在解决语言问题上,往往独辟蹊径,如“韵律分析法”;二是弗斯生前没有出版过一本语言学专著,他的语言理论都发表在平时的论文上,缺乏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而且行文晦涩,表达的意思含糊不清,影响了弗斯语言理论的传播(弗斯的独到见解都发表于论文,收编在两本论文集中。一本是他自己编辑的《1934—1951年语言学论文集》,于1957年出版;一本是他的学生帕尔默编辑的《1952—1959年弗斯论文选》,于1968年出版^[3])。学派领袖的理论不能为外界的人们所推崇,学派在国外的影响自然会受

[1] 罗思明:《伦敦学派语境理论评述》,《安徽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3,17(2),第176页。

[2] 俞洪亮、朱叶秋:《英国现代语言学传统与伦敦学派的发展历程》,《外语教学》,2003,24(1),第45页。

[3] 威雨村:《弗斯和伦敦语言学派——纪念弗斯诞辰一百周年》,《外国语》,1990,(5),第2页。

到影响。例外的是伦敦学派的语境理论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整个语言学界的重视。

在我国,学术界对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研究主要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周文逸的文章《弗斯》(《语言学动态》,1979年第2期)和王宗炎的论文《伦敦学派奠基人弗斯的语言理论》(《国外语言学》,1980年第5期)引起了国内学术界对伦敦学派的关注。随着语义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语境理论的重要性也逐渐为国内学者所认识。本文从两个方面对国内现有的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研究进行整理分析:一是研究者的特点;二是语境理论研究的特点。

伦敦学派作为英国的一个语言学派,其代表人物的理论用英语进行写作。早期对伦敦学派语境理论进行研究的国内专家大部分都是外语界的学者,而且他们的论文大都是发表在以《国外语言学》、《外国语》《现代外语》等为代表的外语研究刊物上。如王宗炎的《伦敦学派奠基人弗斯的语言理论》(《国外语言学》,1980年第5期)、龙日金的《伦敦学派的语言变异理论简介》(《国外语言学》,1982年第4期)、胡壮麟的《韩礼德》(《国外语言学》,1983年第2期)和《韩礼德的语言观》(《外语教学与研究》,1984年第1期)、张德禄的《语域理论简介》(《现代外语》,1987年第4期)和《论语域的预测能力》(《外国语》1990年第4期)等。研究者们往往起着一种桥梁作用,把外来的语境理论经过整理再介绍给国内的学术界或普通读者。早在伦敦学派语境理论被引进国内前,1932年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就提出“题旨情景说”,认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景为第一要义”,^[1]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引入,不仅重新引起学者专家对语境的重视,也让普通读者对伦敦学派的语境理论有了一定的了解。20世纪90年代开始,除了外语学界的专家学者们在外语研究刊物上对语境理论进一步研究外,汉语学界和外语学界对语境研究的相关专著也相继出版。如冯广艺在《语境适应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中主要探讨如何正确认识适应语境的基本规律,王建华在《现代汉语语境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中介绍了现代汉语语境研究的现状和成果,朱永生、严世清、苗兴伟在《功能语言学导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4月)中介绍了欧洲功能主义学派、美国功能主义学派和系统功能学派,朱永生在《语境动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中介绍了语境思想的发展轨迹以及对语境研究趋势的展望。以上专著在语境研究中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伦敦学派的语境理论,但并未详细分析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相关问题,如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形成背景、发展历程以及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贡献和

^[1]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第11页。

局限。

伦教学派语境理论研究的特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对伦教学派语境理论进行一般介绍和评论。对伦教学派语境理论的研究大都从属于伦教学派的研究或伦教学派的代表人物研究,缺乏重点研究和专题研究。这类研究的文章主要见于一些编著和伦教学派研究的早期论文。编著如赵世开的《国外语言学概述》(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年8月)、刘润清的《西方语言学流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年4月)、封宗信的《现代语言学流派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等,论文如周文逸的《弗斯》(《语言学动态》,1979年第2期)、王宗炎的《伦教学派奠基人弗斯的语言理论》(《国外语言学》,1980年第5期)、胡壮麟的《韩礼德》(《国外语言学》,1983年第2期)和《韩礼德的语言观》(《外语教学与研究》,1984年第1期)等,研究者对弗斯和韩礼德的生平、代表理论、语言学上的贡献进行了一般的介绍。

二、在伦教学派语境理论的研究上,各个发展阶段的研究不够全面,研究成果不均衡,缺乏系统整理。如系统功能语法的研究热直接带动了对伦教学派语境理论后期的研究,韩礼德提出的“语域”广受关注,而伦教学派语境理论前期的发展情况则相对较少人研究。在“语域”上的研究文章如龙日金的《伦教学派的语言变异理论简介》(《国外语言学》,1982年第4期)、张德禄的《语域理论简介》(《现代外语》,1987年第4期)和《论语域预测能力》(《外国语》1990年第4期)、孙文荣、王录的《略论韩礼德的语域理论》(《河南职技师院学报》1998年第2期)等。

三、国内学界对语境的重要性有一致性的认识,在语境理论应用上的研究,涉及语言表达、语义理解和语用学等方面,如凌德辉的《论语境与语言的表达》(《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谌华玉的《论语境分析在语义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汕头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高岩的《语境与意义的选择及理解》(《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程艳芳的《语境及其在语用学研究中的作用》(《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魏晏龙的《伦教学派对语用学研究的贡献》(《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四、对语境的总结与思考,这一类的文章从语境的概念、语境理论的发展等方面入手,对语境理论研究进行了一番梳理。如李林菊的《语言学流派及其发展》(《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3期)、仇鑫奕的《语境研究的变化和发展》(《修辞学习》,1999年第3期)、胡壮麟的《语境研究的多元化》(《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

年第3期)、罗思明的《伦敦学派语境理论评述》(《安徽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蓝岚的《国外语言学语境研究概述》(《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和研究其他外国语言学派一样,国内语言学界对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研究正处于一个吸收、完善和应用分析的阶段。国内的语境理论研究专著不断出版,如影响比较大的有冯广艺的《语境适应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王建华的《现代汉语语境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和朱永生的《语境动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遗憾的是国内针对语境理论的源头即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研究至今尚未有相关的研究专著出版。

1.3 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研究意义

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研究意义有两个方面。一是语境的重要性,随着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发展,语境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二是国内对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研究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下面从三个方面来说明语境的重要性。

一是语言的性质。弗斯“把语言看作一种社会现象,看作人们社会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强调语言的工具性,强调语言与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1]语言的社会属性决定了语言的研究必须考虑社会、文化因素。

二是语言的使用离不开语境。张志公认为,“语言总是在一定的交际环境中使用的,因此,分析语言现象,必须把它和它所依赖的语境联系起来,离开一定的语境,把一个语言片断孤立起来分析,就难以确定这个语言片断的结构和意义。”^[2]

三是语言意义的特殊性。莱昂斯(Lyons)认为,“隐含意义和预设意义的推导与语境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语篇的意义并不局限于语篇中实际出现的语句的意义。对这些语句的隐含意义和预设意义也必须给予充分的注意。他还指出,受话者要正确理解含有歧义和隐喻的语句,必须了解这些语句所处的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有些语句不能只从表面意义上去理解,受话者必须通过他和说话者共有的语境知识才能推导出这些语句未曾明示的意义。”^[3]朱永生认为说话者的目的和意图经常超出词汇和句子本身,并引用弗考尼亚(Fauconnier)的话说明语言意义的特殊性,“语言表达形式本身是没有意义的,确切地说,它有一种意义潜能,只有在完整的话语和情景

[1]俞洪亮、朱叶秋:《英国现代语言学传统与伦教学派的发展历程》,《外语教学》,2003,(1),第45页。

[2]朱永生:《语境动态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24页。

[3]朱永生:《语境动态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25-26页。

中意义才能产生。”^[1]

在马林诺夫斯基提出“语境”观点之前，德国的语言学家威格纳（Wegener）在方言学中就提出“情景”（situation）之说，但威格纳的学说并没有引起语言学界的重视。马林诺夫斯基把语境划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情景语境”指的是言语行为发生时的具体情境，“文化语境”指的是说话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背景^[2]。威格纳的“情景理论”和马林诺夫斯基对语境的划分有相似的地方，两个人都注意到了非语言因素——“语境”在语言理解上的作用，但提到“语境”的渊源，人们往往记住的是马林诺夫斯基，这要归功于伦敦学派在语境理论上的开创性和深远影响。伦敦学派虽没有最早提出“语境”概念，但却是最早联系非语言因素研究语义的学派。它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现实生活中使用的语言进行研究，为语义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正因为伦敦学派在语境理论上的开创性和深远影响，伦敦学派的语境理论需要进行一番系统研究。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研究有利于今后更好地对国外最新理论进行借鉴和应用。国内的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研究从简单介绍到对该理论作出较为准确、客观的解释与补充，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仍然存在着一一些研究的薄弱环节：一是对伦敦学派提出语境理论的历史意义不够明确。已有的研究文章未能对伦敦学派在当时提出语境理论的原因进行充分分析，对伦敦学派在当时“为什么”能够提出语境理论以及该理论的历史地位这个问题回答得不够充分。二是就理论谈理论。已有的研究文章大多只对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简单介绍，缺乏对每个发展阶段的成果与不足进行仔细的比较分析。即对伦敦学派语境理论“是什么”这个问题缺乏深入的探讨与分析，对伦敦学派的语境理论的独特性认识不足。

1.4 本文的研究思路、主要观点

本文试图通过对伦敦学派的学术传统与学科传统的介绍，分析伦敦学派语境理论形成的主观原因与客观原因：正是弗斯、韩礼德等人对语言理论“实用性”、“开放性”的追求，才有了对言语交际中语境的重视；正是有了社会学悠久的传统，才有了在“语义”研究中，考虑社会因素，引入非语言因素——“语境”的可能。对伦敦学派语言学思想的介绍，是为了分析伦敦学派的语言研究目的——理论的研究是为了消除语言实际应用中的困境，为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形成找到原始动力；最后通过对伦敦学派

^[1]朱永生：《语境动态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页。

^[2]蓝岚：《国外语言学界语境研究概述》，《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语境理论的发展历程以及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影响与局限性的分析,力求全面、客观地对伦敦学派语境理论进行分析与评价。

本文认为伦敦学派是一个注重“实用性”、“开放性”的语言学派,它的语境理论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也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不断完善的理论。应尽力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伦敦学派语境理论在语言学发展史上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并反映出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独特性。

本文针对“为什么”、“是什么”这两个问题,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在伦敦学派和其他学派之间,以及伦敦学派内部之间进行纵横比较,并对伦敦学派追求实用性、开放性的学术传统进行描述。通过伦敦学派语言学思想包括对语言性质、语言学家的任务、研究方法的比较认识,阐明伦敦学派与语境理论提出的必然联系,回答“为什么”这个问题。通过展示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发展历程,反映出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总结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贡献与局限性,回答“是什么”这个问题。

本文同以往研究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文章不同的是:一是涉及面较广。不仅着眼于伦敦学派语境理论发展的历程,还关注伦敦学派语境理论形成的背景,以及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贡献与局限性。二是除了综述性的介绍外,还通过伦敦学派内部之间以及不同学派之间的比较,力图把一些问题分析清楚,为进一步研究伦敦学派的语境理论提供参考。

本文的立足点是通过收集散见于外国现代语言学派研究的编著以及研究论文中有关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内容,在引用前人研究成果时一一注明成果出处,并对相关成果进行综合比较和整理,以尽可能地还原伦敦学派语境理论在语言学史上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由于国内语言学界还较少地对伦敦学派代表人物的英文专著和论文进行系统地整理,尤其是对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相关英文专著和论文的汉译工作还没有全面开展,再加上本人阅读英文原著存在着一定的困难,这使得本人在研究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过程中较多地依赖于国内现有的对伦敦学派的一些研究成果,失去了原汁原味地把握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特点的机会,这是本文研究的一个遗憾。

第2章 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学术传统和学科传统

罗宾斯在《语言学简史》的前言中写道：“一门（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的）科学，就像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理性或道德的概念一样，也有它自己的历史。每一代科学家都不是从头做起的，而是在他们的学科以及整个科学在他们的时代和他们的文化中所继承的成果的基础上和范围内进行工作的。”^[1] 一门科学或学科的发展是如此，一门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如此：它除了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外，也会受到来自外界因素的影响。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个学科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学科成果的共享成为一种趋势。对一个成熟的理论进行研究，不仅需要考虑源自本学科诸多因素的影响，还要考察理论发展过程中对其他学科成果的借鉴情况。对伦敦学派语境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的描述，就是对伦敦学派语境理论形成过程中的因果联系、影响的说明。伦敦学派的学术传统为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准备了内动力，社会学学科形成之前的悠久传统则为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外动力。本章从伦敦学派的学术传统与学科传统入手，探讨伦敦学派语境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背景。

2.1 学术传统

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最杰出的贡献是他提出的关于普通语言学的理论。自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年出版以后，几乎一切语言学研究都沿着他指出的方向探索、前进。二十世纪的各种语言学流派从索绪尔的理论中汲取营养并得到启发。伦敦学派之所以能成为20世纪受人瞩目的几个学派之一，得益于英国源远流长的语言研究传统，即“实用性”的传统和“开放性”的传统。这两个传统使伦敦学派重视语言的使用、意义的分析以及对来自当时语言学科内外研究成果的借鉴。

2.1.1 “实用性”传统

一个国家、地区的语言研究传统必然同它们的语言研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面临的语言状况相联系。从11世纪开始，英格兰拥有了国民公认的标准语言——英语，这为英国后来的语言研究提供了方便。而在中世纪的欧洲其他国家，拉丁语享有文化上的霸权地位，其他语言一概被视为“俗语”，没有研究的价值。“从16世纪开

^[1]R·H·罗宾斯：《简明语言学史》，许德宝、冯建明等译，第四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3页。

始,对语言的研究在英国蓬勃发展,并被打上了‘实用语言学’的烙印。”^[1]其中对英语的研究一直吸引着众多杰出的语言学家,开创了英国以使用中的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传统,即注重“实用性”的传统,语言的正确使用和推广成为语言研究的目的之一。这一时期,正音学、词典学、速记学、拼法改革以及 John Wilkins 的“哲学语言”显示了英国在语言研究方面的进展。到了 19 世纪末,英国出现了伟大的语音学家亨利·斯威特(Henry Sweet, 1845—1912)。他在 1877 年出版的《语音学手册》“教会了欧洲人语音学,使英国成了语音学这门现代科学的发源地”。^[2]英国是一个多方言的国家,这给国内的经济、文化充分交流造成了一定的障碍。英语和众多方言的并存,以及英帝国广大殖民地中不同语言的存在,使得语音和语义成为语言研究中最受关注的问题,这也形成了英国语言研究中注重“实用性”的传统。这种语言研究的“实用性”传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与伦敦大学学院语音学系两所院系的发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是专门为英国在东方的殖民地培养工作人员的,为适应战事需要,该学院迅速扩大编制,招募大批研究人员,加大对日语的研究力度,以加快培养日语翻译人员的进程。而伦敦大学学院语音学系则因经费和生源的问题而不得不缩小编制。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不仅为英国培养了大批杰出的语言学家,而且也为伦敦学派的语境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历史条件。

英国在国内推广国民公认的标准语言——英语,以便减少国内方言在经济、文化交流上的消极影响;在国外广大殖民地推行英语,以便加强殖民地属民对英国文化的认同,更好地控制殖民地。这些现实需要要求以使用中的语言为研究对象,并促成了英国语言研究“实用性”传统的形成。“实用性”传统下的语言研究除了以语言系统本身为研究对象外,掌握语言系统及其规则,更重要的是为语言的使用提供指导作用。这不同于索绪尔重语言、轻言语的看法。语言是社会中的人们重要的交际工具之一,语言的使用必然带来言语双方的交际。言语交际双方的正常交流建立在对彼此交际意图的了解上,而交际目的又是通过对言语“意义”的分析来形成的,能否对言语“意义”进行正确解读是决定交际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因素。因此,对言语的重视需要对“意义”的产生和解释进行分析。作为欧洲功能主义学派代表的伦教学派,它继承了英国语言学的“实用性”传统,以意义为研究对象,关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

^[1]俞洪亮、朱叶秋:《英国现代语言学传统与伦教学派的发展历程》,外语教学,2003,(1)第44页。

^[2]俞洪亮、朱叶秋:《英国现代语言学传统与伦教学派的发展历程》,外语教学,2003,(1),第44页。

2.1.2 “开放性”传统

英国的语言研究源远流长,不仅有“实用性”传统,把语言研究同语言的实际使用结合起来,使语言研究成果在实践中得到应用,还有“开放性”的传统,即善于吸收来自国内外、语言学科内外的成果,并加以提炼创新,提出新的见解,从而推动语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以英国的语音学研究为例,亨利·斯威特是19世纪末英国最伟大的语音学家之一,他是最早提出“音位”概念的语言学家,并为此建立了语音标记系统。丹尼尔·琼斯继承了亨利·斯威特的语音研究方法,他发明了基本元音参照点。弗斯作为伦敦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秉承英国语言学的“开放性”的传统。在语音上研究,他受到了亨利·斯威特和丹尼尔·琼斯的影响,注重描述语音细节。在前人的成果上,弗斯建立了韵律音位学。韵律音位学具有两个特点,一是采用“多系统”的原则,二是采用“跨音段”的原则。“弗斯的韵律音位学注重语言变体之间的选择系统。他认为,音位学所包含的应该是由可选变体组成的选择系统,而选择系统本身就是意义系统,这也是弗斯为什么强调情景语境重要的主要原因。”^[1]

“弗斯了解欧美语言学的发展情况,重视与国外语言学家的联系。他熟悉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吸收了他的某些论点和术语,但声称自己不属于索绪尔派。他与布拉格学派的特鲁别茨科伊进行过学术交流。30年代后期,特鲁别茨科伊访问伦敦时,弗斯曾与之晤面。特鲁别茨科伊在写给雅柯布逊的信中谈到这次会面的印象,说弗斯是了解他的研究领域的唯一英国语言学家。”^[2]从特鲁别茨科伊对弗斯的评价中,不难看出弗斯在学术研究上的“开放性”态度。弗斯既注重吸收其他学派、语言学家的成果,又不拘泥于已有的成果。韩礼德作为弗斯的学生,继承了弗斯的语言研究成果,但也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批判地继承。弗斯接受了索绪尔把语言看作一个系统的观点。在系统思想的认识上,弗斯区分了语言的系统与结构,把呈聚合关系(即选择关系)的语言形式界定为系统,把呈组合关系(即线性关系)的表现形式称为结构,改变了以往倾向于把系统当作语言的组合关系或结构的看法。但在如何看待语言系统这个问题上,弗斯与索绪尔不同,弗斯认为语言是“多系统”的,语言可以从不同层面进行研究,而不是如索绪尔所说的“单系统”。“韩礼德则继承了弗斯关于系统与结构的区分,但不同意弗斯结构是第一性的观点。语言系统表现为选择关系,选择是第一性

^[1]俞洪亮、朱叶秋:《英国现代语言学传统与伦敦学派的发展历程》,《外语教学》,2003,(1),第45页。

^[2]威雨村:《弗斯和伦敦语言学派——纪念弗斯诞辰一百周年》,《外国语》,1990,(5),第2—3页。

的，结构是第二性的，是各种选择的结果。”^[1]

从以上的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伦敦学派继承了英国语言研究的“开放性”传统：既善于继承又敢于创新，这为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可能。

2.2 学科传统

“索绪尔认为，语言研究的前提就是要把语言现象划分为‘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两个部分。内部要素是指语言系统内符号与符号之间所形成的相互制约、相互的关系；外部要素是指与语言有间接关系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地理、历史等社会因素。而只有立足于内部要素才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语言科学：‘我们关于语言的定义是要把一切跟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简言之，一切跟我们用外部语言学这个术语所指的东西排除出去的。’”^[2] 索绪尔对语言外部要素的排除，使得语言研究对象在相当长的时期局限于语言结构，社会因素与语言的关系得不到重视。

社会语言学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的学科。英国理论语言学学者郝德森 (R. A. Hudson) 在《社会语言学》中把社会语言学界定为联系社会对语言所进行的研究。社会语言学虽然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但是联系社会和语言使用者对语言进行研究并不是 60 年代的发明，相反地，有关词义和社会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已有悠久的传统。因此，对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过启发作用的“联系社会对语言所进行的研究”的传统，我们暂且也把它称为社会语言学的学科传统，尽管当时社会语言学学科还未确立。值得注意的是伦敦学派作为欧洲功能主义学派的主要学派之一，它主要活跃于 20 世纪 40 年代到 60 年代期间，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形成受到了联系社会考察语言的传统的启示，反过来，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构建和发展又推动了社会语言学学科的建设，为社会语言学的建立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本节通过简单回顾社会语言学的一些传统，目的是为了说明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长期的学术积累与历史发展的结果。对伦敦学派语境理论产生背景的描述和分析，不管是伦敦学派自身的学术传统，还是社会语言学的传统，都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理解伦敦学派的语境理论。

在社会语言学确立之前，该学科的性质、任务和研究领域等问题虽然没有得到系统的讨论和解决，但是结合社会因素考察语言问题的思想在中外语言学史上早就出现

^[1]俞洪亮、朱叶秋：《英国现代语言学传统与伦敦学派的发展历程》，《外语教学》，2003，(1)，第 46 页。

^[2]宋宜：《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发微》，成都：巴蜀书社，2004，第 3 页。

过。在古代的中国有诸子百家的“名实之争”，荀子在《正名》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1]事物的名称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适宜的，而是由人们互相约定而成的，用习惯了，就是适宜的。我们可以从事物命名与“约定俗成”的关系看出，仅从语言内部结构出发，并不能解释命名所遵循的规则。“约定俗成”并不完全受语言系统的制约，更多的是社会中的人们形成的一种习惯。因此，考察语言问题应该考虑社会因素和使用语言的人们。在古希腊则有哲学家之间的“词物之争”。到18、19世纪以后，人们对语言的社会性质、语言与社会相互制约、影响的关系已经有更加明确的认识和重视，这些思想都给伦敦学派语境理论带来了启发。

“社会语言学最基本的出发点就在于把语言看成是一种社会现象，主张把语言放到其得以产生和运用的人类社会的大背景中去研究和考察。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社会语言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房德里耶斯(Vendryes)在《语言——历史的语言学引论》中明确提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结合社会最强有力的纽带，它的发展依赖于社会集团的存在。波兰学者博杜恩·德·库尔德内(Baudouin de Courtenay)在《对语言学和语言的几点总的看法》中不仅说明了人类言语活动的社会性质，而且提出了有关语言社会功能多样化的见解，认为应当把一切社会等级的口头语言(言语)和不同年龄(儿童、成人、老人等)及各种身份的人的语言都列入语言学研究范畴”^[2]从这些学者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语言的社会性质是他们的共识，语言的发展和研究离不开社会。真正对伦敦学派语境理论产生直接影响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美两国的社会学、人类学领域的专家学者。这些专家学者有两个特点：一是他们对自己研究领域有着充分的经验积累，特别是美国的学者，为了描述濒临灭绝的语言，对各地的语言状况和使用情况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和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建立在长期的实践工作的基础上的，这使得他们的研究成果更有说服力。二是战后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们聚集在一起工作，这为他们互相借鉴各自不同的思想和理论提供了方便和可能性。因此他们根据调查和研究中发现的社会与语言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现象，所提出的联系社会因素考察语言问题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

社会语言学改变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一贯的研究思维——以语言结构为研究对象，

^[1]章诗同：《荀子简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248页。

^[2]赵蓉晖：《社会语言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第1-2页。

以探讨语言内部的规律为唯一任务。它把索绪尔排除在语言学研究范围之外的“外部要素”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结合社会因素和使用语言的人们对语言进行研究，考察语言的社会变体，揭示语言社会变异的原因和规律，开创了语言学的新纪元。社会语言学肯定“语言外部要素”在语言研究中特殊地位的传统，不仅带来了语言研究观念的变化，拓宽了语言研究的视野，也推动了语境理论的建立，为语言意义的深入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

第3章 伦敦学派的语言学思想

伦敦学派是现代语言学界的一个重要学派，它的理论往往独具特色，如弗斯的“韵律音位学”中采用的跨音段原则和多系统原则，语境理论中的“意义是语境中的功能”^[1]。要弄清楚伦敦学派的语境理论，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前者指语境理论的含义、分类、组成因素及其发展历程和影响；后者指语境理论形成的背景，包括伦敦学派的学术传统、学科传统和伦敦学派的语言学思想。本章通过语言性质、语言学家的任务、研究方法三个方面来梳理伦敦学派的语言学观点，分析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理论基础，并参照和对比其他语言学派在语境问题上的观点，阐释伦敦学派语境理论建立的必然性。

3.1 语言性质

伦敦学派始终把语言及其社会属性联系在一起。本节将重点从语言的含义、语言的使用两个方面来分析伦敦学派对语言社会属性的认识。

“弗斯指出，人出生于自然，成长于教养，因此具有发展性和延续性。同样，语言也有自然性和教养性两个方面。语言有三种含义：1. 我们的本性中有一种渴望和动机，迫使我们使用声音、手势、符号和象征，在这种意义上，语言是一种自然倾向。2. 由于教养的结果，学会了传统的系统或说话的习惯，社会活动使这种系统或习惯保持下来。就是说，语言是系统的。3. 我们用“语言”泛指许多个人的话语或社会生活中无数的话语事件。”^[2]在第一种含义中，语言被定义为“一种自然倾向”，虽然没有涉及社会因素，但是“迫使我们使用声音”的是我们的“一种渴望和动机”，这种使用声音的“渴望和动机”归根结底源于对社会交际的渴望，源于在社会中生存的本能；在第二种含义中，语言不仅仅是人的一种本能，需要“教养”的训练，需要“社会活动”使“传统的系统或说话的习惯保持下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活动强化了人的语言能力，也使语言本身得到发展和不断完善；第三种含义中，“语言”不仅包括个人使用的“语言”也包括社会成员共同使用的“语言”，既包含个人的特性也包含社会的共性，突出了作为语言使用者的“许多个人”和使用环境的“社会生活”。在三种含义中，弗斯分别从语言使用者的动机、语言的发展、语言的表现形式

^[1]赵薇：《功能主义之我见》，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4），第57页。

^[2]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第286页。

三个方面说明了语言的社会属性。

韩礼德作为伦敦学派的重要继承人，在语言思想上和索绪尔、乔姆斯基不同。他不同意索绪尔的观点——“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1] 也不同意乔姆斯基对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的区分。韩礼德认为“语言是‘做事’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知识方式’，并依此区分了‘语言行为潜势’和‘实际语言行为’。语言是社会过程的产品，不是一种知识或能力，而是一种语言和文化所允许的选择范围和社会行为，即在言语行为上所能做的事情的范围，是话语发出者‘能做’什么，而言语是实际做了什么。”^[2] 乔姆斯基所说的知识是语言的心理学范畴，语言能力是个人的特性；韩礼德的做事方式属于语言的社会范畴，即语言与环境的关系，语言行为潜势属于一个语言社团的特性。作为话语发出者，语言和文化允许他选择的范围决定了对语言的认识和使用，既要考虑语言内部要素，掌握语言系统的内部规律，也要考虑语言的外部要素的影响。韩礼德避免了在语言研究中仅仅局限于对语言本体和语言个人使用者进行考察，把更多的因素如社会、文化等纳入研究范围。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语言是人们的一种行为方式，而非思想的对应符号。语言的功能是组织人类的共同活动，它是活动的方式，而不是思想或思维的反映。”^[3] 马林诺夫斯基曾经通过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次普通捕鱼活动来论证他的观点，在捕鱼过程中，人们的叫喊有特殊的含义，一声叫喊意为发现鱼群，另一声叫喊则令船队重新排列。在捕鱼的过程中语言起着组织人们活动的作用。伦敦学派的创始人弗斯接受了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把语言看成是社会过程，是人类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一套硬性规定的符号和标记。把语言看作生活方式，可以从语言对个人的影响进行分析：从个人自身的角度来看，在社会中生活，就必须学会各种语言形式，从而与他人交际；从对他人的角度来看，语言是做事情的方式，是让别人做事的方式，是一种行为方式，是迫使别人行动的方式。因此语言是一种生活方式。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斯不仅改变了人们对语言本质的看法，强调了语言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存在的性质，而且突出了语言在人们社会活动中作为一种工具的重要性，以及语言本身同社会的互动联系。他把语言看作一种社会现象，看作人们社会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性的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强调语言的工具性质、语言与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一个人出生以后，从

[1]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第323页。

[2] 罗思明：《伦敦学派语境理论评述》，《安徽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3，（2），第178页。

[3] 罗思明：《伦敦学派语境理论评述》，《安徽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3，（2），第176页。

学会母语到与他人交谈,已不再是一个自然的生命个体,而是一个社会的人或者说是语言伴随着他进入社会,他必须在社会环境中了解语言、掌握并使用语言。因此,从语言使用的角度来看,语言一开始就不是一套脱离人和社会而孤立存在的符号系统,语言具有明显的社会属性。

此外,语言的意义构成以及语言的发展也都说明了语言的社会属性。“弗斯对语言进行社会学研究是从意义着手的,他所说的意义不局限于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而是包括语言环境中的意义。”^[1]语言环境由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如社会、文化等构成。语言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韩礼德还从个人语言发展的角度论证了语言的社会性。他认为语言有儿童语言和成人语言之分,其语言的形式和意义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弗斯、韩礼德等人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社会性的人与人之间的活动。语言不再仅仅只是一个符号系统,它是人们做事的一种方式,是人们在社会中进行交际的一种重要工具。这种语言观必然改变以往忽视非语言因素的做法,重视语言的社会性,从而为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3.2 语言学家的任务、研究方法

语言学既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也是一门年轻的科学。早在两千多年前世界上不同的地区就开始了各种语言的研究,但是古代的研究都没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未能揭示出语言的本质。直到19世纪比较语言学产生后,才使语言的研究变成了科学的研究。尽管语言的研究已取得很大的成就,还是有一些语言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性,每一个语言学派或语言学家不可能解决所有的语言问题,他们只能选择一定的研究任务,或在某一时期以某一任务为中心,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

弗斯认为“语言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研究语义的产生,语言描写实际上就是语义描写。”^[2]对语义的重视,必然把弗斯的眼光引向对语义的形成和理解有重要影响的语境。语言具有自然性和教养性两个方面。语言使人区别于其他动物,是人的一种本能,但语言的学习和使用离不开社会。假如一个人长期脱离社会,原本掌握的语言能力就会逐渐退化甚至丧失,语言也会逐渐丧失交际功能。因此,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应该是在社会生活中使用的语言。弗斯认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在实际中使用的语言,因为使用语言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方式,语言沉浸在社会交往的直接性之中。”^[3]伦敦

^[1]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第287页。

^[2]朱永生、严世清、苗兴伟:《功能语言学导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第17页。

^[3]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第287页。

学派把在实际中使用的语言作为研究对象,并以研究语义为首要任务。在实际中使用的语言既要遵循语言的内部规则,进行选词组句,也要考虑来自外部因素即社会的影响,采取得体的方式。语义从组成部分来看,有传统意义上的词汇意义、语法意义等,还包括来自语境赋予它的特殊意义;从语义的性质来看,有显性意义和隐性意义之分。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决定了伦敦学派研究语言的方法,是把语言研究与社会研究结合起来,从社会角度去观察语言:“首先分析语言活动的组成部分,说明它们在各个层次上的关系,以及相互关系,最后指出这些成分与所在环境中的人类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换句话说,弗斯是想把语言研究与社会研究结合起来。人是文化价值的创造者和维持者,语言是文化价值的重要成分,所以语言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人的社会本质。”^[1] 弗斯反对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语言。心理学把语言中的社会因素排除在外,忽略了语言的社会属性,不利于语言的深入研究。

总之,语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要求对语言使用的环境进行考察。伦敦学派以研究语义为首要任务,对“语境”的深入研究成为必然。从社会角度研究语言的研究方法,也促成了语境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3.3 伦敦学派与其他学派在“语境”认识上的比较

伦敦学派与其他学派进行比较,特别是将它们对语境的看法进行比较,可以更清晰地了解伦敦学派的语言思想,并为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提出和发展找到理论依据。

1933年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发表他的名著《语言论》,开始了结构主义的鼎盛时期。罗宾斯认为,“语言意义的研究,正是语言学中最不容易进行依照严格的经验主义所理解的科学研究的领域。除了某些具有特定意义的术语如化学术语以外,如果想比较全面地解释一个词或者一句话对于本族语使用者来说,意思究竟是什么,就必须依靠大量而不确定的非语言知识。而布龙菲尔德否认语义的分析会像语言形式的分析那样严谨,对语义的研究持一种悲观的看法,他认为语义的表述,是语言学中最薄弱的一环。”^[2] 而弗斯主张“语言学研究的目的是说明语言的意义”^[3],他要建立起一套语义理论。对语言研究目的以及语义认识的不同看法,造成了伦敦学派和布龙菲尔德为首的结构主义学派对语境的不同态度。布龙菲尔德因为语义和情景的复杂性,放弃了对语境的进一步研究。而伦敦学派则把非语言因素引入语言研究,对语境进行分类、分析语境的构成并概括其变量。

^[1]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第287页。

^[2]R·H·罗宾斯:《简明语言学史》,许德宝、冯建明等译,第四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234页。

^[3]仇鑫奕:《语境研究的变化和发展》,《修辞学习》,1999,(3),第4页。

1957年,乔姆斯基(Chomsky)的《句法结构》的发表标志着转换生成语法的诞生。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转换生成语言学家把语言与人的心理特征和心理活动联系起来,认为语言是一种心理现象。“乔姆斯基的语言独立于任何语境。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研究的是心智,也可以理解为人类通过遗传获得的语言能力或知识,受外界的影响显然不大。因为这部分知识是一些概括的抽象的语法原则,是所有人类语言共有的普遍特征,完全是人类同一生物基因在人脑中产生的必然结果,是人类各种与生俱来的能力中的一种。他只研究这种理想人,而说各种方言,语言能力有所差异的社会人在他的语言著作中从未出现过,因此他的理论完全排斥了语境。”^[1]

伦敦学派的语言学家们则坚持语言研究必须同语境联系起来,包括语义的理解和解释,特别是研究交际中必须重视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等外界因素。他们始终把语言的社会性放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而加以研究,把语言交际看成是一种社会行为,是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在语言能力上,伦敦学派的语言学家认为运用语言的能力是后天发展而成的。因为判断一个人的语言能力并不是看他是否掌握了语法规则,而是看他是否能够在交际中恰当地使用语言和理解语言。

伦敦学派语言学家们对语言社会属性的认识,以及对语义的重视,决定了他们在语言研究必然要对语境进一步加以研究。

^[1]林芳:《乔姆斯基与韩礼德的语言本质观》,《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第68页。

第4章 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发展历程

语境的作用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为有识之士所注意,尽管当时没有语境这种说法。如春秋时期的《论语·宪问》就记载道:“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1]意思是公叔文子该说话时才说,该笑时才笑,该取的时候才取,因此,人们不讨厌他。明确地告诉我们在言语交际时要审时度势,才能够保证交际的顺利进行。

朱永生先生认为把语境作为语言科学的一个概念进行系统研究,却没有如此悠久的历史。“语境作为语言学概念,是德国语言学家威格纳(Wegener)于1885年最先提出来的。威格纳就在他的‘情景理论’中把‘情景’分成‘明显情景’(即交际双方所处的直接情景)和‘记忆情景’(即交际双方能根据自己的记忆所获取的背景知识),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情景因素在方言研究中的重要性。”^[2]或许威格纳只是阐述了语境在方言研究中的重要性,或者他在语言意义的生成上没能作出充分解释,因此威格纳的语境思想在语言学界并没有引起很大反响。直到1923年马林诺夫斯基重新讨论语境这个问题,并根据言语交际中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这个概念,才真正推动了语境研究的发展,这也是现在语言学家们讨论语境时一般以马林诺夫斯基为起点的原因。

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1)酝酿阶段:“语境”思想的借鉴,包括其含义及分类的确定;(2)创立阶段:语境变量的抽象概括;(3)发展阶段:语境因素究竟如何影响语言系统的选择。本章以三个不同阶段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弗斯、韩礼德为主,对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发展进行描述和分析。

4.1 酝酿阶段:马林诺夫斯基的“语境”思想

1923年英国伦敦大学的波兰籍人类语言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给奥格登(Ogden)和理查兹(Richards)所著的《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这本书所写的补录即《原始语言的意义问题》(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s)中,“区分了两种语言使用情境:一种叫‘有魔力的’情境,似乎一个词或一句话可以直接使外部世界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话语的意义就是当时当地正在发生的人

^[1]孔子:《论语》,民俗文化编写组编译,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第99页。

^[2]朱永生:《语境动态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7页。

的活动。用于人类典型的日常活动（如捕鱼，打猎，种地，买卖东西，吃饭，问候等）的语言，其意义直接来自这些活动。第二种语言情境是派生使用，即语言的使用与语言环境没有任何联系。例如书面语言，它的意义不能取自周围的人类活动情况。可以说，马林诺夫斯基实际上区分了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使用。”^[1] 马林诺夫斯基首次提出并解释了“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概念，“情景语境”指话语产生当时及紧接在其前后的各种实际事件。1935年马林诺夫斯基又提出了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的概念：指话语产生的整个文化背景。至此，马林诺夫斯基的语境包括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两大类。

马林诺夫斯基根据长期以来对南太平洋岛土著居民日常生活的观察，在语言与语境的关系上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首先，“语义存在于语境”^[2]。从情景语境来看，人们典型的日常活动语言的意义来自于活动本身，特别是口头语言的意义同当时周围的情况密切相关。从文化语境来看，一种语言同说该语言的人们的文化、习俗等有密切的联系。其次，语言环境中完整的话语才是真正的语言事实。讲话人所处的情景也象上下文一样对语义的解释具有可参照性，“语言是行为的方式，不是思想的信号，话语和环境互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语言环境对于理解语言来说是必不可少的。”^[3]

马林诺夫斯基提出“语境”，与他的学科背景和长期从事的工作有关。马林诺夫斯基以研究土著文化著称，是“人类学功能学派”的创始人。“他曾在新几内亚东部的特罗布兰德群岛做实地调查，研究当地民族的原始文化。正是在实地调查中，马林诺夫斯基发现了语言与社会和文化的关系，开始对语言的功能和意义发生兴趣。”^[4] 在长期工作期间，发现当地土人的话很难译成英语。例如一个划独木船的人把划船的桨叫“wood”（木头），这种叫法同其他地方的叫法有很大的不同，甚至同当地从事其他行业的人们的叫法也不同。如果不把这个人的话与当时的语境结合，就很难理解“wood”指的是什么。根据这些大量相似的例子，他得出结论：“话语常常与周围的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语言环境对于理解话语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人们无法仅仅依靠语言的内部因素来分辨话语的意义；口头话语的意义总是由语言环境决定的。”

^[5] 从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科背景和他的大量实地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出马林诺夫斯基研究语言的目的是通过研究具体语言环境中的语言运用来透视人类学现象，但在人类

^[1]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第279—280页。

^[2]蓝岚：《国外语言学界语境研究概述》，《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第134页。

^[3]蓝岚：《国外语言学界语境研究概述》，《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第134页。

^[4]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第279页。

^[5]封宗信：《现代语言学流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40页。

学的研究中注意到了“语境”对于解释人类学现象的重要性。换一个说法就是，他是因为人类学的研究领域里涉及到了“语境”，才提出“语境”思想。虽然马林诺夫斯基不是在语言学研究领域里自觉地研究“语境”，但是并不妨碍“语境”思想的作用，它为理解话语意义提供了一条新途径。

马林诺夫斯基对语境理论的贡献不仅在于引起人们对情景语境的重视，更重要的在于他已经注意到了意义不仅仅只是词汇意义、语法意义，还包括情境意义。“话语的意义并不来自于构成话语的词的意义，而是来自于话语与其所发生的语境之间的关系”。^[1]这对于意义本身的认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为语言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使意义研究中，原来只考虑语言内部因素而导致许多无法解释的问题得到了解释。不过，他的“语境”思想也存在一定的缺陷：（1）话语的意义取自于语言环境，在充分肯定语境的同时，否定了来自语言内部因素对意义的作用。马林诺夫斯基承认书面语言的意义不能取自周围的人类活动情况，但是他所肯定的与当时的环境有关系的口头语言，它的意义也不一定取自语言环境。刘润清认为口头语言常常与当时的环境有关系，不过，这种情况下的语言也分三种：一种情况是语言与当时的身体活动有直接关系；第二种情况是叙述中使用的语言；第三种情况是在自由的、无目的的社会交谈中使用的语言，即衬语。因此刘润清认为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意义取自语言环境是不能成立的，至少叙述性话语和衬语的意义与语言环境没有直接的关系。^[2]（2）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词的真正意义，归根结底，总是取决于亲身经历中这些方面。“这种语言充满了技术词汇，简单涉及周围环境，表示迅速变化，这一切都以习惯性行为为基础，参加者都很熟悉，并亲身经历过这些行为。”^[3]即没有经历语言所表达的意义就不能认识语言的意义。这否定了人的思维运动，低估了人的认识能力，忽视了语言意义间接获得的客观事实。

本节介绍马林诺夫斯基的“语境”思想，一方面是基于情景语境思想的开创性，给实际使用中的语言的意义解释提供了可能，为意义的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也为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研究提供了相当有益的背景；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马林诺夫斯基的“语境”思想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全面地介绍马林诺夫斯基的“语境”思想的贡献和局限性，可以更清楚地认识伦敦学派在语境理论研究上的贡献。语境理论的建构和发展是由弗斯和韩礼德等人完成的，马林诺夫斯基只是初步提出了“语境”思想，

^[1]封宗信：《现代语言学流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39页。

^[2]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第280-281页。

^[3]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第280页。

对“语境”进行了简单的分类，而且马林诺夫斯基在意义研究中对“语境”即语言外因素重视的同时，也忽视了语言内因素的作用，同时对于构成语境的因素也没有进一步研究，留下了很大的理论空白。

4.2 创立阶段：弗斯的语境理论

马林诺夫斯基从1927年开始一直在伦敦大学经济学院任人类学教授，他虽然是人类学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但在人类学的研究中不时涉及语言问题。20世纪30年代初，弗斯到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担任兼职教师，与马林诺夫斯基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两人在一些语言问题上相谈甚欢，弗斯还经常参加马林诺夫斯基指导的人类学课堂讨论。

在不断的接触中，弗斯在一些语言问题的看法上受到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启发。他继承了马林诺夫斯基的“语境”思想，把马林诺夫斯基的“语境”思想引入语言学，并在这个基础上构建了语境理论。弗斯语境理论的特点是从社会的角度去观察语言，认识语言的意义。“重视语言与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联系，主张联系社会过程进行语言研究。意义不仅与一个特定景象和声音的环境相联结，而且深深地根植于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活动过程中，因此把语言作为社会过程的一个部分加以研究，话语的意义在于它的具体使用。”^[1] 弗斯的这种观点有两个意义：(1)拓宽了语言研究的视野。改变了以往重语言，轻言语的观念，以现实生活中实际应用的语言为研究对象。(2)改变了人们以往对“意义”构成的认识。“意义”既包括形式意义也包括情景意义。

弗斯初步完成了语境理论的构建，依据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他论证了语境理论构建的重要性，为语境理论的建立找到了现实的需要。二是在意义的研究上弥补了马林诺夫斯基的不足，在重视非语言因素的同时，也重视语言因素的作用。三是首次完成了对语境因素的概括。四是弗斯认为语言描写都是语义描写，把“意义是语境中的功能”这个等式的应用范围扩大到语法和语音的分析中，使他在语音学上的成果——“韵律分析理论”，也成为了语境理论的一部分。

弗斯没有直接强调语境的重要性，而是通过意义的重要性进而突出语境的重要性。他从话语的意义入手，在话语意义的构成和话语意义的理解上，为语境理论的建立找到了现实的需要，语言是人们的一种重要交际工具，言语活动是人们实现某种目的的一种有意义的活动，因此对语言的描写和分析就不可避免地要对意义作出描写和分析。意义不仅包括词汇和语法意义，还应该包括情景语境中的意义。情景意义存在

^[1] 威雨村：《弗斯和伦敦语言学派——纪念弗斯诞辰一百周年》，《外国语》，1990，(5)，第4页。

的语言事实需要一种新的理论即语境理论的建立。

弗斯赋予“意义”以特殊的内涵。“将‘意义’定义为任何层面上的一個成分与该层面上的语境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任何一句话的‘意义’由以下五个层面组成：“(1) 语音层即该句中每一个音素与语音上下文的关系；(2) 搭配层即该句中每一个词项在句中的彼此之间的关系；(3) 语法层即该句中词与词的內部结构及在句子中的组合关系；(4) 句法层即该句的句型结构特点；(5) 语境层即该句与说这句话时的情景上下文的关系。”^[1]弗斯赞同马林诺夫斯基对话语意义理解的看法，即结合情景语境理解话语意义。但马林诺夫斯基的情景语境概念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过分强调语言外部的情景语境，即强调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忽视了语言内部；二是情景语境过分强调“现在”，忽视了过去和未来。弗斯从五个层面来认识“意义”，既研究了情景语境，也分析了语言语境；既考虑了语言因素，也考虑了非语言因素。

针对马林诺夫斯基语境两分法中的缺陷——忽视语言因素的语境，弗斯把语境分为两类，以是否由语言因素构成作为划分标准。一类语境存在于由语言内部因素构成的上下文，即一个结构各个成分之间的组合关系和一个系统内项目或单位之间的聚合关系；另一类语境来自于语言外部，是由非语言因素构成。^[2]对于第二类语境，即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情景语境”，弗斯扩大了它的概念，认为“情景语境”涉及一个人的全部经历和文化历史，融合了一个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而不只是现在。弗斯这样的分类更符合语言的意义，在语言内部中，从不同层次上对语言意义进行解释；在语言外部上，则比较全面涉及个人和社会因素。

弗斯对语言环境的定义包括整个言语的文化背景和个人的历史，而不仅仅是语言出现的环境中人们所从事正在进行的活动。这与马林诺夫斯基对“语境”的分类大同小异，但是弗斯的情景语境是指一系列情景语境，体现了弗斯一贯的系统思想：每一个情景语境都包含在更大的情景语境之中，最后所有的情景语境都在文化情境中发挥作用。

弗斯首次概括了语境因素，他主要是对比较复杂的第二类语境即“情景语境”的组成因素进行分析。弗斯把“情景语境”抽象成若干类别的观念，以便应用于社会过程中各种可以重复出现的典型事件。情景语境又分为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内部关系可描写为：

^[1]魏晏龙：《伦敦学派对话语学研究的贡献》，《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第57页。

^[2]威雨村：《弗斯和伦敦语言学派——纪念弗斯诞辰一百周年》，《外国语》，1990，（5），第6页。

- (1) 参加者的有关特征:
 - (a) 参加者的语言行为
 - (b) 参加者的非语言行为
- (2) 有关的事物
- (3) 语言行为的效果

外部关系可描写为:

- (1) 参与者所属的经济、宗教、社会结构。
- (2) 话语类型——独白、记事。
- (3) 个人情况——参与者的年龄和性别。
- (4) 言语类别——社交中的恭维话、骂人的话。^[1]

弗斯对情景语境因素首次的抽象概括,使人们在结合语境分析意义的过程中,不仅能更加全面地考虑到各种因素,而且能更清楚地解释语境的变化造成意义变化的现象。一定语境相对于一组语言形式的选择,语境一旦发生变化,其中语言形式的选择也会相应发生变化,语言意义也随着发生变化。这是语境理论的重大突破与飞跃,它不仅注意到了语境在意义构成、解释的作用,还通过情景语境因素的概括,说明语境对语言结构或语言功能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对韩礼德进一步探讨语境变量与语言结构或语言功能的对应关系有很大启发。

弗斯初步完成了构建语境理论的任务,但语境究竟如何影响语言的使用,这个任务还没有得到解决,需要由韩礼德来完成。

4.3 发展阶段:韩礼德的语境理论

韩礼德 1925 年生于英格兰约克郡里兹,青年时期在伦敦大学主修中国语言文学,1947 年到 1950 年期间,他曾到中国的北京大学和岭南大学留学,先后师从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和王力。他返回英国后在弗斯等人的指导下,1955 年完成了用我国十四世纪北方官话译述的《元朝秘史》一书的语言学分析,获得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韩礼德对语言学的主要贡献是在继承以弗斯为首的伦敦学派的理论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当代的系统——功能语法(Systemic-functional grammar)。”^[2]

作为伦敦学派集大成者,韩礼德在弗斯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语境理论。一是通过分析语言的性质和语义的性质说明语境的重要性。二是结合系统思想,从系统与

^[1]威雨村:《弗斯和伦敦语言学派——纪念弗斯诞辰一百周年》,《外国语》,1990,(5),第7页。

^[2]胡壮麟:《韩礼德》,《国外语言学》,1983,(2),第60页。

结构的关系、意义的确定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修正弗斯的一些观点。三是从理论实际应用的角度对语境进一步研究,对情景语境的构成因素重新划分,提出一个全新的术语“语域”,“语域的确定主要是把语境特征和一定的语法结构及词汇一一对应起来。因此,语境被认为是语言活动的一个背景,语境特征和语言特征加在一起,构成了语域的各种变体。”^[1]四是就语境因素如何支配语言系统选择的问题进一步研究。

韩礼德认为“如果人们集中注意的是语言系统的形式问题,如语法和词汇,那么可在语言内部解决;但若把语言系统当作整体考虑,那就必须从外部来确定对语义系统进行区别的标准,即属于同一语义类型的语言材料是否具有同一意义标记。如以文字系统作为标准,会忽视了语调的差异;以概念系统为标准,即根据两个概念的异同进行区别,也无法说明概念系统或语义系统本身的异同又是怎样区分的。因此,语义是语言和语言之外的某种东西的交叉。语言之外的某种东西便是社会语境或情景,考察语义就必须考虑到语境。情景分析法和情景意义与其他层次的分析法和意义的区别在于:(1)前者涉及有关世界的非语言特征;(2)说话者和听话者都要掌握有关文化的非语言部分。”^[2]因此,从整体考虑语言系统的角度上来看,语言是一个意义潜势系统,不是所有合乎语法句子的总和,它涉及到语言内部的因素,也涉及到语言的外部因素,即社会语境或情景,因此必须结合语境研究语言;其次从“语义”的性质来看,语义是语言和语言之外的某种东西的交叉,作为语言之外的社会“语境”是语义分析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韩礼德接受了弗斯对系统与结构进行区分的观点,把语言的聚合关系叫做系统,把组合关系叫做结构,并把它们作为描写和分析语言的基本框架。但他认为“人们在各个语义系统的选择都会影响语言的产生,因而结构是各个语义功能在语言中能被体现的产物。”^[3]因此,系统才是第一性的,改变了弗斯所认为的结构是第一性的观点。在意义的确定上,弗斯认为意义是语境的功能,语言只能从环境中获得意义。即语境决定语义的产生、语义的理解,夸大了语境的作用。韩礼德则对语境的作用作出了中肯的评价,他区分了语言潜势(供讲话人选择的各种可能的形式)和语言行为(讲话人实际选择的形式),认为语言系统是一个可供选择的语义网络,语义是一定语境下的选择,即一个人在特定的环境下使用的语言形式就是在这个系统网络中作出某种选择的结果。认为意义是对系统的有目的的选择,而不是由语境事先决定的。

[1]金顺德:《系统语法理论及其语言观》,《外国语》,1990,(6),第22页。

[2]胡社麟、朱永生等:《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9页。

[3]徐振忠:《从索绪尔、乔姆斯基到韩礼德:学术创新的光辉典范》,《黎明职业大学学报》,2004,(1),第40页。

韩礼德接受了弗斯的语境观,但他与弗斯重在分析“语言上下文”不同,他重点分析了情景语境与词汇和语法的对应关系,讨论了语境对语言使用的影响,并且对情景语境的变量重新概括,提出了“语域”,从理论实际应用的角度对语境进一步研究。情景语境同词汇、语法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如说话者可以根据听话的对象、地点等的不同而选用不同的词汇项目来表示同一个意义,同理,说话者也可以根据不同的对象和地点而选用不同的语法形式。为了更好地体现语境对语言使用的影响,韩礼德根据格里高利和卡罗尔(Gregory & Carroll)的观点,将决定语言特征的情景语境重新概括为:(1)话语范围(field of discourse),即交谈的话题以及场地等情景因素。话题可能是技术性的,也可能是非技术性的。话语范围对词汇的选择有很大的制约作用;(2)话语基调(tenor of discourse),即交际双方的社会角色关系即个人基调。(韩礼德的话语基调只指格里高利所说的个人基调,而不包括功能基调)(3)话语方式(mode of discourse),即语言活动所采用的媒介或渠道,如口头方式、书面方式。^[1]三者综合起来就是指说话内容是什么,说话对象是什么样的人和说话用的是何种方式。这三个方面要求所用的语言适应他们以便达到更好的效果。情景语境的三个组成部分趋向于决定意义系统中的三个组成部分,即话语范围决定概念意义,话语方式决定语篇意义,话语基调决定人际意义。概念意义、语篇意义、人际意义同时在词汇、语法层上体现出来。“语境的三个组成部分任何一项发生改变都会导致意义的变化,引起语言的变异,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的语言变体即语域。”^[2]

韩礼德将语境理论应用于语言表达和意义的分析中,并详细分析语境和语言结构之间的关系,这是语境理论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韩礼德将语境、语言形式、话语的意义三者联系结合起来分析。一方面一定的情景语境对应于某种相应的语言形式,另一方面语言形式反映和建构语境,在新的语境中产生意义。或者“已知语境的特定方面(如讨论的主题,语言使用者,交际方式)确定可能要表达的意义,和为了表述那些意义而可能使用的语言”。^[3]形成了从语境——语言形式——话语的意义这样一条发展链,从以前对意义的理解离不开语境的描述过程发展到了语境是如何影响意义的解释过程。

韩礼德作为伦敦学派的集大成者,他不仅探讨了话语范围、话语基调、话语方式三个语境组成因素对语言使用的影响,即对语言的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的

[1]胡壮麟、朱永生等:《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274页。

[2]孙文荣、王录:《略论韩礼德的语域理论》,《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1998,(2),第80页。

[3]胡壮麟、朱永生等:《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9页。

影响,从而制约不同的语义系统。韩礼德还认为“语言符号系统本身与语境因素之间的制约关系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其原因是讲话者已经选用的语义系统会帮助交际双方判断和预测他们所处的语境。这种研究对于帮助人们认识语言的整体运作方式有积极的推动作用。”^[1] 韩礼德进一步推动了伦敦学派语境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关于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局限性,将在第五章的第二节中加以说明。

4.4 伦敦学派语境理论各阶段成果

马林诺夫斯基、弗斯、韩礼德作为伦敦学派语境理论三个发展阶段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观点代表了三个阶段的成果,对语境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不同贡献。下面这份表格比较直观地显示了各个阶段所取得的不同成果:

代表人物	发展阶段	成果	代表观点	缺陷	主要学科资源
马林诺夫斯基	酝酿阶段	1. 《原始语言中的意义问题》 2. 《珊瑚园及其魔力》	1. 语境概念 2. 意义是语境中的功能	1. 强调语言外部,忽视语言内部 2. 一切词的一切意义都来自于亲身经历	人类语言学
弗斯	创立阶段	1. 《1934—1935年语言学论文集》 2. 《1952—1959年弗斯论文选》	1. “语言的上下文”和“情境的上下文” 2. 概括情景语境的要素	未解释语境如何影响语言的使用	社会学
韩礼德	发展阶段	1. 《语言功能的探索》 2. 《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对语言和社会意义的理解》	1. 语域概念 2. 意义是对系统有目的的选择	重视语言的社会过程,忽视语言的心理过程	系统功能语言学

同时这份表格也说明,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发展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从片面到比较全面地认识语境,如马林诺夫斯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的两分法到弗斯的“语言的上下文”和“情景的上下文”的两分法;从描述语境在语言研究中的重要性到解释语境因素如何影响语言的使用,显示出语境理论的实用性。

^[1]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等:《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284页。

第5章 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历史贡献与局限性

在如何评价语言科学发展中产生的语言理论上,罗宾斯和刘润清都显示出一种科学的态度。罗宾斯从语言学史研究的角度总结了语言理论研究存在的倾向——用现在的眼光评判过去,并提出了自己的研究看法。“一门科学的简明历史概论,如通常出现在入门教科书中的那样,难免会用现在的眼光看待过去,把注意力集中在早期研究中那些看起来与现在的研究或者发生特别的关系、或者惊人地没有任何关系的方面。在这样的限制下,出现这种情形是正常的,也几乎是难以避免的。但是这样作有一种危险,就是把一门科学过去的所有研究工作,都用有利于现在的观点去评价,并且把一门科学的历史,看成是时而稳定、时而中断或改变方向,以这门科学的现状为预定目标的进步。这并不是说,当一门科学肯定取得新进展时,我们也不应该用后来的成就和现在的状况来评价过去同一领域中的工作。实际上,这样的评价是有益的。它能让我们看出特定环境、文明的特定时期和特定范围对一门科学的哪些方面最有利。我们所要作的,是努力认清过去如何演变到现在的情况,以及科学在不断变化的文化环境中的不断变化的情况。应该尽量避免故意只选择早期工作中可以同当代关心的方面发生特殊关系的那些部分。”^[1]刘润清认为,“西方语言学发展很快,流派层出不穷,分支也不断出现。对这些不同的理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我认为,首先要了解、研究,然后决定取舍。不了解,不研究,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是不现实的,也是有害的。在没有了解之前就加以否定,这不是严肃的科学态度。只有在了解之后,才有取舍可言。对待一种理论,不应该只看它的实用性,还应该注意它的理论价值。有些科学的抽象对所处的时代没有任何现实贡献,而在百年之后人们才重新发现它的伟大意义。”^[2]从以上两位专家的看法中,不管是罗宾斯的“努力认清过去如何演变到现在的情况”,还是刘润清的“了解、研究,然后决定取舍”以及对“实用性”和“理论价值”的兼顾,都显示出他们对语言研究的科学态度:还原历史原貌,对语言理论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

5.1 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地位与贡献

我们要对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地位和贡献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不仅要了解语境

^[1]R·H·罗宾斯:《简明语言学史》,许德宝、冯建明等译,第四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4页。

^[2]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第287页。

理论形成的背景及其发展过程,还要研究伦敦学派语境理论在语言学发展史上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即伦敦学派语境理论有助于解决什么问题,在实际中解决了什么问题,以及自身还存在着什么问题。以便尽可能地还原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历史面貌。

5.1.1 语境的自觉运用

古今中外,人们对语境的研究可谓源远流长。探讨语境问题在我国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从诸子的文章中都能找到一些相关的例子。例如,“《论语·季氏》中说:‘言未及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荀子·劝学》篇中说:‘故谓可与言而言谓之傲,可与言而不言谓之隐,不观气色而言谓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隐,不瞽,谨顺其身。’《墨子·佚文》中说:‘子禽问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虾蟆蛙蝇,日夜而鸣,舌干而人不听之。今鹤鸡时夜而鸣,天下振动。多言无益?唯其言之时也。’《论语·乡党》中说:‘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1] 这些例子涉及了交际中言语的度和量的把握,充分说明了言语表达要注意时机和场合的观点。国外学者探讨语境,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时期,亚里斯多德在《修辞学》中针对修辞手法的使用曾说过:“所有这些手法的使用,都有合乎时宜与不合时宜之分。”^[2] 中外古代学者们在很早之前就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语境思想,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没有自觉地把它们整理成系统的思想,甚至没有明确地提出“语境”这个术语,只是依据自己平时说话、写文章的经验,写下了一些体会。因此只能称之为一种不自觉运用“语境”的思想。

1885年,德国语言学家威格纳才明确提出了“语境”概念,并认为“语境概念包含的因素很多,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说话时的客观情景,二是受话者能够直接联想到的各种成分或因素,三是人的整个心态,尤指交际双方对各自身份的意识程度。”^[3] 但是,威格纳的观点并未引起广泛的影响。1923年,经过长期的总结,马林诺夫斯基提出了“情景语境”概念,并明确指出人们在分析、理解词义时要考虑“语境”。1935年,马林诺夫斯基又提出了“文化语境”概念。弗斯在接受马林诺夫斯基“语境”思想的基础上,不仅修正了马林诺夫斯基的缺陷,把“语境”分为由语言因素构成的“语言上下文”和由非语言因素构成的“情景上下文”,而且对“语境”的构成因素进行了概括,对人们在特定场合下的语言使用进行考察。这是语言学家对“语境”自觉运用的开始。韩礼德则在弗斯的基础上,对“语境”的构成因素进一步整理

[1]冯广艺:《语境适应论》,汉口: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第26-28页。

[2]亚里斯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第165页。

[3]朱永生:《语境动态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3页。

概括,提出了“语域”思想,研究“语境”与语言系统之间的对应关系。为“语境”理论在言语交际活动、语言教学活动等实践中的自觉运用做好了准备。

从古代对语境思想的不自觉运用到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建立和发展,伦敦学派语境理论在语境研究和应用上有以下几个主要成就:(1)把纷繁复杂的语境用“两分法”加以区分:马林诺夫斯基的“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使语境研究做到具体与一般相结合;弗斯的“语言内语境”和“语言外语境”,使语境研究兼顾语言内因素和语言外因素。(2)把具体的语境因素加以概括。弗斯把“情景语境”概括为参与者的有关特征、相关事物、言语活动产生的影响三个方面;韩礼德则概括为话语范围、话语基调、话语方式的三个方面,使语境研究更加类型化,也使语境的运用更具操作性。(3)把语境因素与语言使用结合起来考察,认为两者之间存在互相影响和互相制约的关系。

5.1.2 语义研究的新途径

语义无疑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从语言的构成要素来看,无论按语音、语义两分法,还是再加词汇、语法的四分法,语义都是语言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层面或核心要素。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语义研究都比语音和语法研究要早得多,但是在研究的进展上或取得的成果上,语义研究反而缓慢的多。语义研究的困境或者语义层面研究的滞后,既有内因即来自语义本身的原因,也有外因即对语义的误解。

语义是人脑对客观事物或现象的概括反映,并以一定的语词形式固定下来。它的内容来源于客观世界,借助于人的主观因素加以概括,并以语言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语义是一个并非处于静态的单质的封闭系统,而是一个不断接受多种异质因素介入的开放系统。这是人类独有的自然语言一个最大的特点,也是其语形和语义之间的关系变幻不定的原因。”^[1]也就是说,语义通过语言形式表达,两者之间不只是一一对应的固定模式,而是一个动态的、互动的过程,呈现出“一对多”或“多对一”的情况。而且语义受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的影响,是一个需要综合各种条件进行考虑的问题。语义本身的这种复杂情况给语义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如果说语义自身的复杂情况给语义研究造成困境,那么长期以来对语义的忽视和误解,也造成了语义研究的滞后。现代语言学开山鼻祖索绪尔指出了语言符号的本质,并区分了能指与所指、语言系统与语言现象、共时与历时,推动语言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同时,索绪尔又把语言学分为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语言的语言学

^[1]刘焕辉:《言与意之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11页。

和言语的语言学。他倡导的是内部语言学、语言的语言学，主张研究的是语言的内部要素、结构和系统，是就语言本身而研究语言。这就使得语义研究在一种自闭的结构系统中进行。布龙菲尔德主张“依照严格的经验主义（以人们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为依据，经过严格的解释和实践）考察科学研究的对象即每个人可以感知的事物，也就是具有时间和空间坐标的事物。”^[1] 他对于可听、可说、可记的语音研究或者可说、可写的词汇研究很有把握，但在语言意义的研究上却流露出了悲观的情绪。罗宾斯认为，布龙菲尔德的悲观情绪诸如“‘语义的表述，是语言学中最薄弱的一环。’以及否认语义的分析会像语言形式的分析那样严谨，结果使几乎整整一代语言学家都忽视了深入的语义研究，甚至还把语义学排除在语言学家的主要研究之外。”^[2] 值得一提的是布龙菲尔德认为精确的语义分析需要大量的语言学以外的知识，因为语义“只有无所不知的通才才能分析或者加以系统地排列”。^[3] 可惜的是布龙菲尔德本人未能结合语言学以外方面的知识对语义进行研究。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创始人乔姆斯基在语言学界掀起了一场“革命”，在语言研究方法上完全不同于结构主义语言学，乔姆斯基也注意到了上下文语境对符号转换的制约性，但他研究的是纯语言或理想语言，语言理论都建立在一个理想的基础上。但是，不受空间、时间、社会阶层等因素制约的所谓理想的语言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语言的运用总是具体人的运用，必定是在一定的环境之下进行的。因此乔姆斯基的语言研究也是脱离具体社会环境的，把语言变成了一套语法规则，与语言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被排斥在语言学研究的大门之外。

从语言学流派来看，以法国语言学家布内阿尔1897年出版的《语义学探索》为标记的传统语义学，虽然从词汇学中独立出来，成为语言学的一门专门研究语义的分支新学科，但是仅限于词义范围。20世纪三十年代兴起于欧洲的结构语义学，虽然突破了传统语义学的局限，但仍然把语义限定在语言系统中进行研究，对于语义进入交际后在语义层面发生的变化难以解释。语义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学派自身的局限性使语义研究处于困境中，语义的深入研究需要新的元素的加入、新的理论的产生。

伦敦学派以实际应用中的语言为研究对象，并依此提出的语境理论无疑为语义的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从马林诺夫斯基提出“语境”概念到弗斯语境理论的建构再到韩礼德对语境理论的完善，语境理论把非语言因素引入语言研究领域。特别是

[1] R·H·罗宾斯：《简明语言学史》，许德宝、冯建明等译，第四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233页。

[2] R·H·罗宾斯：《简明语言学史》，许德宝、冯建明等译，第四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234页。

[3]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袁家骅、赵世开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第197页。

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斯提出“语义存在于语境”的观点，重视非语言因素即情境对语义形成的影响，为语义的研究开拓了新的研究视野：第一，对语义的再认识，从过去把语义看成所代表或者所指的东西，转变为把语义理解成功能，即词语及其组合的用法。第二，解决了以往把语言当作一种单一系统为指导思想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即同样的语言形式在实际的言语交际中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意义。

语境理论从语义的形成入手，论证了语义同语境两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并且结合语境对语义进行分析。首先语境理论认可语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语义的丰富性来源于语义构成因素的丰富性，即语义的构成一方面来源于语言形式，另一方面来源于语言使用的环境，包括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特别是社会、文化等非语言因素。其次结合语境对语义进行分析，即考察语义，必须考虑语言使用的情境。为了更深入地研究语境，对“语境”进行了抽象的概括，使语义的分析能比较全面地考虑到各种“语境”因素。最后是把语境、语言形式、语义三者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和考察。结合语境对语义进行分析，不仅从理论上解决了语义深入研究的问题，而且在实践中也证明是可行的。

5.1.3 语境理论的应用

伦敦学派语境理论不仅为语义研究提供了一条新途径，也直接促成了语用学的发展。语用学从定义上来说就是一门研究语言如何使用的学问，也有人把它概括为利用语境来推断意义的学问。尽管人们对语用学的定义和范围还有一些争议，但是语用学研究都离不开语言使用的规律、交际的原则和语境因素的制约。重视语境因素的研究，是语用学这门学科从诞生之日起就具备的一个重要特点。语用学和语义学虽然都是研究语言的语义，但是它们的侧重点不同，语用学把特定的“语境”中的语言的意义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著名的英国语言学家利奇用两个非常简单的疑问句为我们直观地回答了语用学和语义学在研究意义方面的区别：“语义学研究的句子意义是回答问题‘X表示什么意义(What does X mean)’，而语用学研究的话语意义是回答问题‘你说X是要表示什么意义(What do you mean by X?)’很明显，第二个问句中的X是被放在某一个特定的情景或语境中来考虑的，充分体现了话语的情景或语境对语用学研究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1] 伦敦学派语境理论为语用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资源。任何一种语用学，无论是普通的语用学理论研究还是具体的语言使用研究，离开了语境，就失去了考察的标准。

^[1] 魏晏龙：《伦敦学派对语用学研究的贡献》，《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第56页。

伦敦学派的语境理论不仅推动了语言学的发展,在其他的领域中如语言学习、翻译、“人工对话”等方面也得到运用。语言学习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培养在不同的语境中运用恰当语言进行表达的能力。过去的语言学习,就是死记硬背语言规则,死背离开语境的孤立的句子,但是语法上规范句子并不是在所有的场合中都适用,语言的使用要受一定的交际场合制约,也就是在什么样的场合说什么样的话,否则就如同在庄重的场合穿着背心,在非正式的场合中穿着笔挺的西装一样尴尬。语言使用者的言语交际能力培养离开了具体的语言环境,就只能沦为语法规则的“奴隶”了。现在,语言学习中盛行的情景学习法和交际学习法就是利用语境理论的成果,针对以往学习中不分场合的缺陷,提出的一个有效措施。它对于灵活运用语言,提高实际的言语交际能力有很大的作用。翻译离不开语境,这已成为翻译界学者们的共识。因为翻译时确定词的意义,必须对具体语言环境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然后才能找到一种最佳的翻译方式。“人机对话”又称“自然语言理解”,它研究如何使计算机学会懂得人类日常的自然语言,从而建立人跟计算机之间用自然交谈的模型。计算机理解自然语言,包括口语和书面语两个方面,这都离不开语境。例如,在汉语的语音输出中,语境问题直接关系到输出语音的识别度。

5.2 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局限性

伦敦学派的语境理论,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探讨语言的性质,分析语义的构成,认为语义的理解离不开语言的使用环境即“语境”。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语境”概念,对“语境”作了分类,概括了“语境”的构成因素,并把“语境”同语言的实际使用联系起来,考察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和规律。伦敦学派对语境因素的概括、语境与语义结构的对应关系的研究都源于一个共识,这就是类似的客观语境特征将导致类似的语言行为。这种分析方法主张从外部世界即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系统和结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1)忽视了内部世界,未从说话者个体的内心世界出发去探讨语境与语言系统之间的关系。说话者作为语言的使用者,对语言的使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忽视了语言使用的独特性或个性,往往是一种语境对应一种语言形式结构,因而带有抽象化和理想化的色彩。社会心理学家列文(Lewin)认为“对语言使用起决定性作用的并不是客观真实的而是交际双方所能感受的‘生命空间’(life space)。研究语境不仅需要从语境类型的角度进行,而且更需要从具体的带有个性化的语言行为深入展开。”^[1]因此,在重视语言的社会过程的同时,也要注意语

^[1]朱永生:《语境动态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22页。

言的心理过程。

其次伦敦学派语境理论对语境的研究以静态研究为主,“人们把语境看作是预先确定的因素组合。”^[1]即语境要素是先于交际过程而存在的,语境要素对交际双方在语言使用上有制约作用,但这种制约作用是一一对应的。弗斯尽管认识到语境在语义生成、解释上的重要作用,但对于语境的动态特征没有给与足够的重视。韩礼德接过弗斯未完成的任务,在语境对语言使用的影响上,特别是在语境与语义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上进行了考察,但这种考察依然是一种静态的考察:按韩礼德对情景语境的划分,即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三个语境要素从言语活动的起始阶段保持不变,从而保持语境的一致性。所以这种考察最多只能预测语言使用对语言形式的选择,预测语言的字面意义,而不能预测语言的隐含意义。人们交际活动的情景中并不是语言学家们所认为的那样一直不变的或者孤立的,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这三个语境因素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不断调整,有时各自发生变化有时同步发生变化,从而对语言使用产生影响。

伦敦学派语境理论在语境研究和语境应用上所存在的局限,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主观的原因来看,伦敦学派代表人物对语言的社会属性的认识,决定了伦敦学派从社会文化角度出发去考察语境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只能是从客观存在的各方面的社会因素来分析各种语言问题,其理论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因素,如语言使用时的心理因素。从客观原因上来看,有两个原因:一是语境本身的复杂性,语境涉及到语言的知识,语言的上下文、交际的社会文化背景,语言的使用者,语言交际的互动等因素。弗斯和韩礼德尽管对语境因素进行了概括,但还是有一些情景因素未能包含在其中并受到重视。二是时代的局限,当时对语境的特征还未有充分的认识。

一种新的理论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重视,并不是因为它能解决所有存在的问题,而是它能提供一种新的解决问题的思路,能够在某一方面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伦敦学派语境理论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研究语言的系统和结构,特别是长期困扰人们的语义问题,把非语言因素引入语言研究,拓宽了人们的语言研究视野,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语境、意义、形式三者之间的问题。分析该理论的贡献,特别是历史上的贡献,以及它的局限性,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深入地研究语境。

^[1]朱永生:《语境动态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28页。

5.3 今后语境研究的趋势

从德国语言学家威格纳提出“语境”概念开始，人们对“语境”就有不同认识，包括语境的定义、分类、构成因素等，但人们对“语境”本身的重要性却有着共同的想法。“语言是人类社会所持有的一种信息系统，无论其产生、演变或发展，还是进行信息的传递、接收或加工，总是以一定的条件为前提，并受其影响和制约的。这种前提条件，就是语境——语言环境。语境是语言和语言研究的十分重要的内容之一。”

^[1] 近年来，“语境”成为语义学家、语用学家、民俗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及认知学家等共同关心的课题，这不仅是人们随着研究的深入对“语境”的重要性有更清醒的认识，还在于“语境”研究具有很大的应用价值。

仇鑫奕认为几十年来人们对语境的研究主要围绕着以下两个方面：

(1) 语境研究视角的变化。马林诺夫斯基从理解词义的角度提出了语境概念，弗斯把语境分为“语言内上下文”和“语言外上下文”，弗斯选择交际中的话语为观察语境的立足点，与他要建立一套语义理论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后来用语境概念进行语义解释的大多数人都继承了这一基本视角。随着语言学的发展，语境被用于探索交际主体使用语言的规律时，观察语境的视角又转移到了交际主体上。

(2) 语境研究内容的变化。从对语境概念的界定、对语境要素的归纳、说明和对语境研究意义的阐释，到侧重于对语境的特征、类型、功能和作用的探讨，对语境因素的总结开始走向体系化。因此，从语境研究视角和语境研究内容上来看，今后语境研究趋势应该是对言语交际过程中的语境作全面系统的分析和描述。^[2]下面围绕对语境系统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和描述这个观点，简要分析语境动态研究的必要性，以及将从社会文化角度出发的研究方法和从心理认知角度出发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的必要性。

伦敦学派语境理论对“语境”的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由于时代局限、研究思路、“语境”的复杂性等原因还存在着一些难以避免的不足之处。语言学家斯玻伯(Sperber, D)和威尔逊(Wilson, D)针对伦敦学派语境理论和语用学以静态研究为主的问题，提出了动态研究的语境观。他们认为“语境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概念，因为交际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语境不是听话人在话语理解之前预先确定的，而是在话语理解过程中不断选择的结果。在交际中，说话者根据自己的交际目的和意图

^[1]西楨光正：《语境与语言研究》，《中国语文》，1991，(3)，第195页。

^[2]仇鑫奕：《语境研究的变化和发展》，《修辞学习》，1999，(3)，第4-6页。

不断地选择认知语境,而语境也随着交际的进行不断得到扩展和补充。”^[1] 交际者不是在固定不变的语境下交际,不是被动地为语境所控制,交际者主动操控语境来实现他们的交际目的,他们不仅使话语符合语境,也主动构建和再构建有利于自己的语境:交际双方以一定的认知环境为背景,在不断的交流过程中,新的经历添加到潜在的语境之中,构成新的语境。动态语境观从新的视角定义交际能力,交际能力不仅仅指拥有产生合适的交际行为的知识和能力,它还指能够主动地操纵语境来实现交际目的和为语义的理解创造合适的语境。

对于语境的特征,语言学界除了语境是静态的和动态的两种观点外,还有一些语言学家认为所谓静态和动态实际上是相对的。赛夫顿(Sefton, P. M)认为“语境是由多种参数构成的。在这些参数当中,有些是相对静态的,有些是相对动态的,另一些则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的。”^[2]他用一种新颖的方式对他的这种观点进行了解说:如一个人骑自行车在公路上行驶,离公路最远的是远方的山脉,离公路最近的是栅栏,介于山脉和栅栏之间的是房屋。对于行进中的自行车手来说,远方的山脉是相对静止的,距离最近的栅栏是活动的,而介于山脉和栅栏之间的房屋则处于中间状态。当然,这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自行车走过很长一段路程,远方的山脉也会逐渐变小直至完全消失。赛夫顿用山脉、栅栏、房屋和骑自行车的人的关系来说明语境动静观,这种相对语境观在语言交际和语义理解中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毕竟动态的研究还要以静态研究为基础。从语言交际本身来看,人们的交际是一个积极的互动过程,尽管有些因素在言语交际开始之前就已经确定,但语境因素在言语交际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因此语境的动态研究将是今后“语境”研究的一个趋势。

国内外许多语言学者对语境研究的方法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以伦敦学派语境理论为代表的从社会文化角度出发的研究方法,主张把语言看作是社会行为,力图从说话者的外部因素即社会文化因素对语言的性质、结构和功能进行考察;另一种是从心理认知角度出发,主张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知识,力图从说话者的内部因素即心理机制和认知过程对语言的性质、意义的产生和交换进行研究。伦敦学派语境理论在语境研究中采用从社会文化角度出发的研究方法,排斥心理认知的方法,只讨论社会文化语境,不涉及心理认知语境,使该理论带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从心理认知角度出发的研究方法则从说话者个人入手,研究语言使用者的心理认知机制及其受到的种种制约。

[1]蓝岚:《国外语言学界语境研究概述》,《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4,(5),第136页。

[2]朱永生:《语境动态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42页。

两种研究方法是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很难说得清谁优谁劣。“虽然语言学研究有不同的方法，但如果某一种研究方法对另一种研究方法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补充作用，我们就应该以宽阔的胸怀，接受不同的理论，并从中吸收有益的部分，对自己的理论进行充实和提高，从而使语言学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步。”^[1] 言语交际是人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活动，它涉及到语言使用者的心理，也涉及到语言的社会文化背景。因此，今后的语境研究另一趋势就是根据言语交际的实际情况将以上两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即将说话者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结合起来，更深入地分析语境与语言使用的关系。

^[1]朱永生：《语境动态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58页。

附录

国内关于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研究论著要目（1979——2006）

一、专著

- (1) 王宗炎：《语言问题探索》，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 (2) 冯志伟：《现代语言学流派》，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 (3) 徐志民：《欧美语言学简史》，上海：学林出版社，1990.
- (4) 赵世开：《国外语言学概述——流派和代表人物》，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
- (5) 朱永生：《语言·语篇·语境》，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
- (6) 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 (7) 冯广艺：《语境适应论》，汉口：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 (8) 朱永生、严世清：《系统功能语言学多维思考》，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 (9) 朱永生、严世清、苗兴伟：《功能语言学导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 (10) 朱永生：《语境动态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11) 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等：《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12) 封宗信：《现代语言学流派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二、期刊论文

- (1) 周逸：《弗斯》，《语言学动态》，1979，(2).
- (2) 王宗炎：《伦敦学派奠基人 J. R. Firth 的语言理论》，《国外语言学》，1980，(5).
- (3) 龙日金：《伦敦学派的语言变异理论简介》，《国外语言学》，1982，(4).
- (4) 胡壮麟：《韩礼德》，《国外语言学》，1983，(2).
- (5) 胡壮麟：《韩礼德的语言观》，《外语教学与研究》，1984，(1).
- (6) 张德禄：《语域理论简介》，《现代外语》，1987，(4).
- (7) 张德禄：《论语域的预测能力》，《外国语》，1990，(4).
- (8) 林纪诚：《浅评〈系统功能语法概论〉》，《外国语》，1990，(5).
- (9) 戚雨村：《弗斯和伦敦语言学派——纪念弗斯诞辰一百周年》，《外国语》，1990，(5).
- (10) 金顺德：《系统语法规论及其语言观》，《外国语》，1990，(6).

- (11) 凌德辉:《论语境与语言的表达》,《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4,(1).
- (12) 阮咏梅:《人类学研究对语言学家的启示》,《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7,(3).
- (13) 湛华玉:《论语境分析在语义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汕头大学学报》,1998,(2).
- (14) 孙文荣,王录:《略论韩礼德的语域理论》,《河南职技师院学报》,1998,(2).
- (15) 苗兴伟:《系统功能语法与转换生成语法对比刍议》,《外语研究》,1998,(3).
- (16) 李林菊:《语言学流派及其发展》,《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9,(3).
- (17) 仇鑫奕:《语境研究的变化和发展》,《修辞学习》,1999,(3).
- (18) 黄国文:《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40年发展述评》,《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1).
- (19) 武波:《重读加德纳——英国语言学史札记》,《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4).
- (20) 胡壮麟:《语境研究的多元化》,《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3).
- (21) 王建华:《关于语境的构成与分类》,《语言文字应用》,2002,(3).
- (22) 李国庆:《弗斯语言学视野中的搭配研究:理论、描述方法及个案分析》,《外语教学》,2002,(6).
- (23) 俞洪亮,朱叶秋:《英国现代语言学传统与伦教学派的发展历程》,《外语教学》,2003,(1).
- (24) 林芳:《乔姆斯基与韩礼德的语言本质观》,《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
- (25) 罗思明:《伦敦学派语境理论评述》,《安徽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3,(2).
- (26) 武波:《加德纳与早期语用学思想》,《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3,(2).
- (27) 程艳芳:《语境及其在语用学研究中的作用》,《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1).
- (28) 徐振忠:《从索绪尔、乔姆斯基到韩礼德:学术创新的光辉典范》,《黎明职业大学学报》,2004,(1).
- (29) 杨永林,李鸣:《社会文化,词语为镜》,《外语研究》,2004,(1).
- (30) 王宏燕:《从传统语境到认知语境》,《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 (31) 魏晏龙:《伦敦学派对语用学研究的贡献》,《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 (32) 原学梅:《语境理论对黛茜·米勒交际悲剧的解释》,《郑州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1).
- (33) 曾绪:《浅议语境理论》,《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 (34) 邱凌,彭再新:《试论语境的特征》,《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 (35) 韩彩英:《语境本质论》,《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5).
- (36) 蓝岚:《国外语言学界语境研究概述》,《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 (37) 高岩:《语境与意义的选择及理解》,《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
- (38) 赵薇:《功能主义之我见》,《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4).

参考文献

- (1)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袁家骅、赵世开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2) 王宗炎:《伦敦学派奠基人 J. R. Firth 的语言理论》,《国外语言学》,1980,(5).
- (3) 龙日金:《伦敦学派的语言变异理论简介》,《国外语言学》,1982,(4).
- (4) 胡壮麟:《韩礼德》,《国外语言学》,1983,(2).
- (5) 胡壮麟:《韩礼德的语言观》,《外语教学与研究》,1984,(1)
- (6) 王宗炎:《语言问题探索》,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 (7) 冯志伟:《现代语言学流派》,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 (8) 张德禄:《语域理论简介》,《现代外语》,1987,(4).
- (9) 迈克尔·葛里高利、苏珊·卡洛尔:《语言和情景》,徐家祯译,北京:语文出版社,1988.
- (10) 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系统功能语法概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 (11) 赵世开:《国外语言学概述》,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
- (12) 张德禄:《论语域的预测能力》,《外国语》,1990,(4).
- (13) 林纪诚:《浅评系统功能语法概论》,《外国语》,1990,(5).
- (14) 戚雨村:《弗斯和伦敦语言学派——纪念弗斯诞辰一百周年》,《外国语》,1990,(5).
- (15) 金顺德:《系统语法理论及其语言观》,《外国语》,1990,(6).
- (16)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北京:三联书店,1991.
- (17) 西楨光正:《语境与语言研究》,《中国语文》,1991,(3).
- (18) 岑麒祥:《国外语言学论文选译》,北京:语文出版社,1992.
- (19) 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 (20) 李永生,王扬:《略论语境中词义的理解与辨析》,《山东外语教学》,1996,(4).
- (21) R·H·罗宾斯:《简明语言学史》,许德宝、冯建明等译,第四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 (22) 孙文荣:《韩礼德的语域理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8,(2)
- (23) 孙文荣,王录:《略论韩礼德的语域理论》,《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1998,(2).
- (24) 张德禄:《韩礼德功能文体学理论述评》,《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1.
- (25) 仇鑫奕:《语境研究的变化和发展》,《修辞学习》,1999,(3).
- (26) 冯广艺:《语境适应论》,汉口: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 (27) 胡壮麟:《功能主义纵横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 (28) 胡学文:《论语境对意义的影响》,《池州师专学报》,2000,(1).
- (29) 胡壮麟:《功能主义的文体观》,《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1).
- (30) 高彦梅:《话语基调模式探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1).
- (31) 朱永生,严世清:《系统功能语言学多维思考》,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 (32)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 (33) 仇鑫奕:《语境是相对于什么而言的》,《汉语学习》,2001,(5).
- (34) 刘焕辉:《言与意之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 (35) 李国庆:《弗斯语言学视野中的搭配研究:理论、描述方法及个案分析》,《外语教学》,2002,(6).
- (36) 翟丽霞,王琦:《西方现代文体学的沿革及其主要学派》,《济南大学学报》,2002,12(增刊).
- (37) 俞洪亮、朱叶秋:《英国现代语言学传统与伦教学派的发展历程》,《外语教学》,2003,(1).
- (38) 林芳:《乔姆斯基与韩礼德的语言本质观》,《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
- (39) 张绍杰:《任意符号系统和自然符号系统—索绪尔与韩礼德语言哲学思想探索》,《东北师大学报》,2003,(2).
- (40) 罗思明:《伦敦学派语境理论评述》,《安徽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3,(2).
- (41) 石秀文:《语境理论的历史回顾与系统分析》,《长春工业大学学报》,2003,(4).
- (42) 苏晓军:《试论韩礼德与索绪尔符号理论的相容性》,《山东外语教学》,2003,(6).
- (43) 程艳芳:《语境及其在语用学研究中的作用》,《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1).
- (44) 徐振忠:《从索绪尔、乔姆斯基到韩礼德:学术创新的光辉典范》,《黎明职业大学学报》,2004,(1).
- (45) 王宏燕:《从传统语境到认知语境》,《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 (46) 魏晏龙:《伦敦学派对语用学研究的贡献》,《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 (47) 朱永生、严世清、苗兴伟:《功能语言学导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4月.
- (48) 曾绪:《浅议语境理论》,《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 (49) 邱凌、彭再新:《试论语境的特征》,《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 (50) 宋宜:《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发微》,成都:巴蜀书社,2004.
- (51) 张德禄:《韩礼德功能语言教学思想探索》,《外语教学》,2004,(3).
- (52) 张延飞、林铁:《论索绪尔和韩礼德语言层次结构理论的渊源关系》,《烟台教育学院学报》,2004,(4).
- (53) 蓝岚:《国外语言学界语境研究概述》,《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 (54) 周丽红、成昭伟:《比读:弗斯与布龙菲尔德》,《辽宁工学院学报》,2005,(1).
- (55) 朱永生:《语境动态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56) 赵蓉晖：《社会语言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 (57) 方宗祥：《语境理论研究的多维思考》，《南京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 (58) 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等：《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59) 封宗信：《现代语言学流派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60) 赵薇：《功能主义之我见》，《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4）。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1. 《伦敦学派与语境理论的发展》发表于《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5 年第 24 卷.
2. 《〈鸡缸〉的话语修辞分析》发表于《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6 年第 5 期.

致谢

硕士学位论文的完成,意味着三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活也即将结束,我的学业能够顺利完成要感谢许多老师的指导和帮助。我能够在参加两年工作后重新回到母校福建师范大学继续攻读硕士学位,首先要感谢谭学纯老师,他在大学本科期间所开设的选修课“人与人的对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他的学者风范和课堂中宽松自由的学习讨论气氛,吸引着我,激励着我在考研的道路上前进。在研究生学习期间,谭学纯老师作为我的导师,不仅在学习上给了我许多指导,而且在生活上也给了我很多帮助。特别是我撰写学位论文期间,为我仔细分析学派研究在当前的学术意义,不仅在选题上给了我建议,而且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更是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意见,在学术规范上也给了我诸多指导。由于本人天资愚钝,谭老师的许多宝贵建议未能在我的论文中得到很好体现,论文中所存在的不足应由我完全负责。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拥有近百年的办学历史,众多德高望重的教授,在文学院“传道授业解惑”。在此,我要感谢马重奇老师、沙平老师、陈泽平老师、朱玲老师、祝敏青老师、徐启庭老师、林志强等老师的帮助,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开阔了我的学术视野,更启发了我的论文写作思路。

此外,还要感谢文章所引用的参考文献的作者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本文正是建立在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得以完成。

感谢所有关心和爱护我的人!

张涛

2007年4月

个人简历



姓名：张涛

性别：男

民族：汉

出生年月：1978年4月

籍贯：福建漳州

教育经历：	1995.9—1998.7	漳州市诏安县第一中学高中部		
	1998.9—2002.7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科	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
	2004.9—2007.7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研究生	应用语言学专业
社会实践：	2002.8—2004.8	诏安县官陂中学		语文教师
	2006.1—2007.7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职教部		辅导员